

“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

——缅怀王智量先生

陈晓兰

新年的第二日的夜晚，传来王智量先生离世的噩耗。

近三年来屡屡想去看望他老人家，但一想到要穿越半个城市与陌生人隔空密接与次密接带来的诸种麻烦和危险，也就作罢。2022年4月的一天，拨通了王智量先生家的电话，惊讶地发现他已经重听，连电话也听不清了。他说“我看不见，你跟吴老师说吧”，就把电话递给了吴老师。得知他们二老一切还好，也就放了心，计划待一切恢复正常以后，一定要去看望老人家。总以为他永远在那里，想见就可以见到的……

当我不在人世时，当原先是我的一切都已散为尘埃时……啊，你大约会活得比我更长久，——求你可别来到我的坟前……你在那儿是无事可做的。请别忘了我……然而也请在每日的烦恼、快乐、困苦当中去记起我。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不想妨碍它，使它不能静静地流。但是，当你独自一人时，当那情情的和莫名的哀愁，那一颗善良的心灵都那么熟悉的哀愁，向你袭来时，请你拿起一本我们心爱的书……

我拿起屠格涅夫《散文诗 帕拉莎》，这是王智量先生晚年最喜爱的一本书，他在“致读者”中称它为“绚丽多彩的书”：“不译不足以满足我的感情，不译不足以表现我对它的爱有多么深。因为它的美、丰富的、挖掘不尽的。”我的书架上放着两个版本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但却在馈赠者不在人世时，这首《当我不在人世时》才第一次击中受赠者。当他在人生的暮年，把屠格涅夫在人生的暮年创作的以“衰老”为主题的诗篇转化成中文时，他是寄托着对于自己一生的多少回忆和生命随时消失的哀思啊。

他在“译者”中说：
《散文诗》中尤其真挚动人的，也许要算其中那些洋溢着伤感的、描述老年心情的篇章吧。1882年《欧洲导报》上最初发表前51篇时，作家为它们所定的总题便是《衰老》(Senilia)。读者读到这些篇章时，我们仿佛面对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他那力求继续为其人生奋斗而又不力从他的哀愁深感同情。这是一位多么热爱生活又眷恋人世的老人，但是死神却时常在恐吓他，威胁着要



本文作者收藏的王智量先生的译作和画作

带走他……而展望未来，将只会是自己的死亡和别人的空洞的怀念。

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智量先生赠予的画。那是几年前他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病房里，画在一次性的餐盘上的，两幅兰花，一束菊花，四只虾，还有一幅无题画：一只虾被四只围攻，远处的两只急急地前来，它们各个身躬偻张，除了中间被围攻的那只。我们称它为“虾(瞎)斗”图。

在我的书架上，这里那里散落着智量先生馈赠的书，现在我把他们都聚在一起：《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叶甫盖尼·奥涅金》(花城出版社2012)、《双子座——帕斯捷尔纳克诗选》(花城出版社2012)、《屠格涅夫散文诗》(花城出版社2013)、《智量文集》(2013)全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此外，还有他与谭绍凯、胡日佳两位先生合编的《托尔斯泰选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他与多人合译的《汤因比多卷本的《希特勒的欧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我于1990年认识王智量先生，那年中国比较文学年在贵阳召开，会后，王智量先生访问贵州大学，与我的硕士生导师胡日佳先生和我们几位在读学生聚餐畅谈。那时的王先生已是一头白发，高大的身躯，爽朗的笑声，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王先生鼓励我们多读书、多做翻译，并问我们有没有翻译的东西。我那时沉迷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就把一篇

翻译的习作拿给他看，他回去后便推荐给《文艺理论研究》，很快便刊发了，这对一个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学生而言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硕士毕业后，我到兰州大学工作。1995年，我意外地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光华先生那里收到了王先生辗转带给我的小说《饥饿的山村》，也即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94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刘先生是王先生的同辈人，他们在一个会议上相见，王先生就托他把随身携带的这本书带给我。记得当时刘先生看到我时有点惊讶的样子，也许他原以为受赠者应该是他的同辈人吧。的确，以我当时的阅历，是不能够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的。既然它是以上世纪60年代的甘肃为历史背景的，我就写了一篇简短的书评发表于《兰州日报》，文章自然是写得不得要领，王先生看到这篇书评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论及作品的主旨以及知识分子、现实主义等等，而这些问题，也只有随着我们年岁渐长、对于人世有了切身的体验后才能够真正理解。我属于60后，过渡的一代，有更多的机会聆听父辈们的历史记忆，但他们刻骨铭心的经历，于我们而言，依然不过是别人的故事。初从大学走向社会，工作、生活诸种压力，迷惘彷徨，无暇他顾，与王智量先生的联系后来也就中断了。

再次见到王智量先生已是2008年5月，贾植芳先生的追思会上。时隔18

年，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当他听到我的名字时，特意转过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似乎在问：“你在上海，为什么不来看我呀？”我低下了头，感到愧疚。2009年春节，我和胡日佳老师、师母一起去拜访了王智量先生。爬上华东师大一村老旧楼房的四楼，惊讶于他那据说只有41平方米使用面积的狭窄逼仄的居住条件，书挤占了几乎所有的空间，即使是书房的书桌上也堆满了书籍、画具，只留下中间一点空处用于日常翻译、写作、绘画。海阔天空的谈话、遥远的星空往事、远离世俗生活的文学世界、爽朗的笑声，使主人和客人忘记身在何处。王智量先生也未在客人面前流露出丝毫窘迫，似乎这些都是极其正常的。问他过得好不好，他说：“好，我现在什么都不干，每月还有几千块钱，你说还有什么不好的？”1996年，王先生从华东师大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将全部精力投入翻译工作——于他而言，翻译、写作已不是工作，而是日常生活本身。

王家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屠格涅夫肖像，下面有一行题字：“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这句话格被他视为座右铭，出自屠格涅夫于1878年4月创作的散文诗《生活规则》其一，全文四五十个字：

你想要安宁吗？去跟人交往，但要独自生活，什么也别去参与，什么也别去怜惜。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王智量先生的一篇赏析传达了这他的理解：

这是孤独者在生活中为自己选定的人生态度，是他从冷峻人情和凄凉世态中得出的痛心经验，那种阴森可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不遭痛苦就不能享受到幸福甜味的生活的真谛。这是作者在痛苦地总结自己的人生感受，倾吐他沉重的孤独感。

除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外，智量先生所翻译的作品大都是在后半生完成的。他在盛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对于人生的思考，使他深切地领会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他常常说自己与这些作家心灵相通。可以说，他的翻译是融入了他个人生命感悟的再创作。

王智量先生自己的创作亦深受俄罗斯作家的影响。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中那个负伤的、软弱的知识分子，他真挚的情感、深切的良知、丰富的内心与其行动上的软弱无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在任何事务上都没有发言权，甚至缺乏行动的胆量，在人们的疾苦面前保持缄默。他使我们联想到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小说对于这个知识分子的矛盾性的忏悔式表现，对于农村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对于富有鲜明地方色彩的西北自然风光的象征主义描绘，都体现了作者所熟悉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这部小说的开头，便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老妇人》异曲同工。贾植芳先生在为这部小说所写的序中指出：“作者那深邃的俄国文学的素养，不仅锻炼了他的描写功力，而且使作品更富于独特的文化和美学意蕴。”

写于2000年初的自传体作品《人海漂浮记》，是王智量前半生个人生活的历史性的记忆，是让自己和自己的过去面对，当然这种面对是一种痛苦。他在“后记”中说：“因为写得太过伤心，每每会‘泪沾襟’，实在无法写下去，便就此卡住，再也坐不到电脑前。……因此，搞得像一个残废似的。”这部作品尽管是以作者前半生的个人经历为核心线索，但又不是纯粹写自己，更主要的是记述在一个人的至暗时刻，所遇到的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正是这些人的善良和实际的行动，拯救了落难者。这些人她是她的母亲，是河北太行山区、西北黄土土地上的农民、乡村教师，是上海码头的工人、弄弄派出所里的户籍民警，还有同样处于人生低谷中的知识分子。作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恩的心情，抒写了这些人的美好人性，赞扬底层人民身上的“小的美德们”。

《人海漂浮记》的第一篇“永远的忏悔”，历史背景是1940年，主人公是作者的母亲，逃难到后方靠种地艰难过活，儿子只是随便一封信告诉母亲自己身体不舒服，母亲便凑了几块钱步行十二个小时来看望儿子。当儿子看见像乞丐般的母亲时，却嫌弃母亲出现在同学面前。母亲懂得孩子的心思但不会有丝毫的介怀，更不会减少她丝毫的爱，但她也以最恰当的方式让孩子认识

到自己的错。她使得作者终生记着做人的朴素道理：“做人要有良心。人活着，不能心里只有自己。”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母亲都是作者最坚强的支柱，与儿子一同肩负命运的重轭。晚年的王智量先生，灿烂的笑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常常流泪，只为母亲。他不断地讲述由于自己的人生遭际，使母亲在晚年饱受受苦，这是他无法摆脱的痛苦，愧疚折磨着他。

《人海漂浮记》中所写的农民王良，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民的典型，面对下放劳动改造的“右派”，王良一家没有歧视只有同情，他们并不管右派左派，也不问他是否真的犯错，只是出于朴素的为人之道，善待别人，善待生命，自己贫困缺粮，却让外人吃饱，在危险的时候出手相救。作者写道：“他单纯、老实，善良得就像太行山上的土草木一样，他是他周围平凡的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黄浦江边》在艺术手法上非常成熟，主要人物冯哥以及他身边几位临时搬运工的个性表现得栩栩如生。他们没有多少知识，没有固定工作，处于社会底层，但却有良心，讲义气，互助团结，对于读书人心存怜惜，对于别人的困难感同身受，不以抽象的道德标准审视别人。正是由于这些人善意的帮忙，使得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一次次绝处逢生。

晚年的王智量先生总是向来访者讲述着这些故事。当他不能再写、不能再译时，他就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然而，这回忆是多么沉重多么痛苦啊。“谁记住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因此，诚如俄罗斯作家爱伦堡所说：“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因为怀着对于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这个世纪太艰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忆的包袱，甚至连两次大战这样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变成了历史烟云。”因此，他要目睹的人、岁月、生活记录下来，以免健忘的人类重复历史。

由于几十年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其他世界名著的翻译中所做的贡献，王智量先生被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但他从不以翻译家和专家自居。他说：“既然作家努力让我们感悟到世界的伟大和一个人的渺小，那么让我们生活得更谦虚些吧。愿我们只为一件事尽力吧：愿我们所带来的确是有益的食物。”他只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能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点价值的工作”而“感到欣慰”。

现在，智量先生永远地离开了，但他又好像没有离去。他通过翻译的再创作，将伟大作家留给世界的遗产转化成中国人的精神食粮，它们“是美的，丰富的，挖掘不尽的”。

2023年1月9日
上海

是“咸蛋”还是“咸鸭蛋”？

南风之薰

咸蛋·藏菜

李荣

汪曾祺先生曾为别人的一本书做了一篇序文，最后有一句“上海卖咸鸭蛋的店铺里总要用一字条特别标明：‘高邮咸鸭蛋’”。序文寄出后，汪先生追了一封信去，信中说：“(那一句里)‘鸭’字不要。上海人都说‘咸蛋’，没有说‘咸鸭蛋’的。想来是抄录时加了一个字。”

汪曾祺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西南联大毕业后，曾经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两年左右，与黄裳先生和黄永玉先生等好友时相过从，对于上海多少有点“发言权”。他后来那封信里言“上海人都说‘咸蛋’”云云，大约即是当时身在上海由市井见闻中所得到的印象和记忆吧，因为直接的，而非听人转述或者书本上看来的，所以说得很是肯定。

我自小一直生活在上海，六十年代出生，所以四十年代上海人如何称呼“咸蛋”，我没有直接的知识。但是，我家里面的老辈，比如我的老阿奶，嘉定黄渡人，她的上海话应该是“原汁原味”的。她说“咸蛋”，但也说“腌鸭蛋”。只要是吃泡饭(吃剩的干米饭加水烧成)或者“新鲜粥”(直接用米粒加水“新鲜”煮成)的时候，常常会问一句：“要不要来一只腌鸭蛋？”此外，说上海话的亲戚朋友，称“咸蛋”为“咸鸭蛋”的，也很多。

不过，汪先生的想法也有他的道理。把“咸蛋”说成“咸鸭蛋”，多少有点多此一举，因为用来腌咸蛋的，基本上都是鸭蛋。“咸鸭蛋”“咸鸭蛋”，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我就听说我太太的一个同学好奇心强、也喜欢做厨房里的“创新之举”，有一次便尝试用鸡蛋来腌咸蛋。我没有亲自尝过这样的“创新成果”，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但听说“滋味没有咸鸭蛋好”。这首先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吧——吃腌咸鸭蛋，难免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咸鸭蛋”的味道，觉得不像就肯定认为不如了。

但是仔细想想，鸡蛋与鸭蛋相比，蛋白蛋黄都要嫩得多，腌成咸蛋“吃口”就会比较弱一点，而且鸡蛋日常的用量大，烹饪法多种多样，以鲜嫩的吃法为主，腌成“咸蛋”，有点“浪费食材”的意思了；而鸭蛋与鸭蛋相比，质地更为粗笨，腌作咸蛋的话估计吃起来腥味较重，除非口味比较奇特，一般人大概有点受不了。所以“咸蛋”这个称号才成了咸鸭蛋的专称了。汪先生当时印象里上海人只叫“咸蛋、咸蛋”，应该也是出入不大的。

上海人吃咸蛋有几种吃法。一种是一只带壳的蛋，对切成“两半”或者再对切而成“四半”。这种吃法要么是家里人口多，切开来吃，大家都有份，人人都可

以吃到；要么是家里摆桌头，用来装一只冷盘，排列开来看起来好看一点；要么就是有的人家“吃口”偏淡的，一人吃整只蛋嫌太咸了，切开来分个几次吃。还有一种吃法是把咸蛋的壳整个剥干净，放在泡饭或粥里吃，但这样吃法的人应该不多的。

我最喜欢的吃法，是拿起咸蛋，对着光亮处照一照，看见蛋的内部哪一头隐约有一点点的地方，便用这一头对着桌面轻轻地把蛋壳敲开，剥出一个小“开口”，用筷子慢慢地挖着吃。最要注意的是第一筷戳下去，不能用力过猛，否则，如果咸蛋质量好，油多，一用力，油便会挤崩出来，不单单自己弄得“油头油手”的，不凑巧还会溅到旁边人的衣服上，抹不了、擦不净，那就有点恼人了。只要这个起头照顾到了，那么蛋白蛋黄“搭配”吃着，一小筷子咸蛋的滋味可以“下”好几口的白粥。一只蛋吃光，一大碗热粥也就下肚。热乎乎，清清爽爽，口有余香，真是不错。尤其前不久发烧退热之后，就想着可以吃一顿粥了，再加一只咸蛋。

从小听惯的老阿奶嘴里的“小藏菜”

我现在遇到有关上海话上的问题，常常会请教褚半农先生，但彼此只是微信问答，到现在还没有见过面，他惠赐了他的《莘庄方言》等好几本大著，让我受益不小。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在“初识”之前，褚先生通过文汇报杂志版的“回音壁”专栏，还曾指教过我文章中一处存疑的地方。

那是我谈论《清嘉录》里有关“叫嚷子”的一篇小文，我说“叫嚷子”有点像含在嘴里的“哨子”。哨子上海方言里称“叫bian”，这个“bian”音，到底落在哪个字上，我确定不了。直接想到的，就是“叫嚷”，但难以自信。于是便去问了另一位上海话的研究专家，他说应该是“叫扁”，因为它的形状是扁扁的。我想应该有道理吧，而且他又是专门家，所

以在文章里便写为“叫扁”。文章在笔会上登出来时。笔会有一个好传统，专设一个“回音壁”栏目，专门登载读者来信，指正副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的疏失。一段时间以后，“回音壁”上便有了褚先生针对我那篇文章的“回音”，认为应该写为“叫嚷”，而且引用了不少的证据，说服力不小。

最近，看到褚先生新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到我上海本地话，叫青菜为藏菜。一下子让我记起，我家老阿奶过去一直把小青菜叫做“小藏菜”，音完全对。但是如今普通最常见的写法，却是“小棠菜”。音近，但与老上海的发音，还是有距离。记得在沪郊采访的时候，还听过这么一种解释：“小藏菜”是肖塘菜，因为奉贤肖塘是菜乡，青菜出名。但我感觉这应该是不正确的。

我给褚先生发了一条微信，说了我的一些猜想，大致有三种可能：一是藏菜之藏，是因为藏青色，由青而藏，连类及之。我们从小在上海吃到的青菜，好像有一种，是深绿甚至偏紫的某种。或许藏菜是指的这一种，亦未可知。

二是古籍里的藏菜。《古今图书集成》中云：“藏菜即箭秆菜，经霜，煮熟甚美，冬日腌藏以备用，故名。”徐光启《农政全书》列于“芸苔”之下曰：“藏菜七月下种，寒露前后治畦分栽，栽时用水浇之，待活，以清粪水浇，遇西风则不可浇。”《姑苏志》云：“藏菜出郡城，肥白而长，名箭干菜。冬月腌藏以备用，故名。”《江南通志》云：“箭秆白菜，菘之属也。取其中心嫩芽以羹，味甘美绝伦。其外大茎叶以盐腌之，可以御冬。正月食之，尤香脆，吴下谓之藏菜。然不若江宁郡城者之佳也。”

从这几条记载来看，藏菜又名箭干菜。由这“箭干”的取名而言，应是形容这种菜的形状是长长的。不同的记载，归其种属亦有不同。《农政全书》归在“芸苔”类，那便是油菜，油菜籽可榨油，但有些品种的油菜，其细嫩的茎叶亦可作蔬菜食用。而《江南通志》则归之为“菘之属”，菘是白菜类，江南的青菜，正是一种

小白菜。这里便有一点“混乱”。不过，上海人历来的食用菜蔬中，有青菜，也有一种叫“菜薹”，老人有时候就直接叫其为“油菜”。我自己小时候，看到大人买菜回来的菜篮子里有这样的油菜，菜头上还有几簇黄黄的小花，就会摘下来放在小口瓶里，灌满水，花也会渐渐开放，足有好多天可供赏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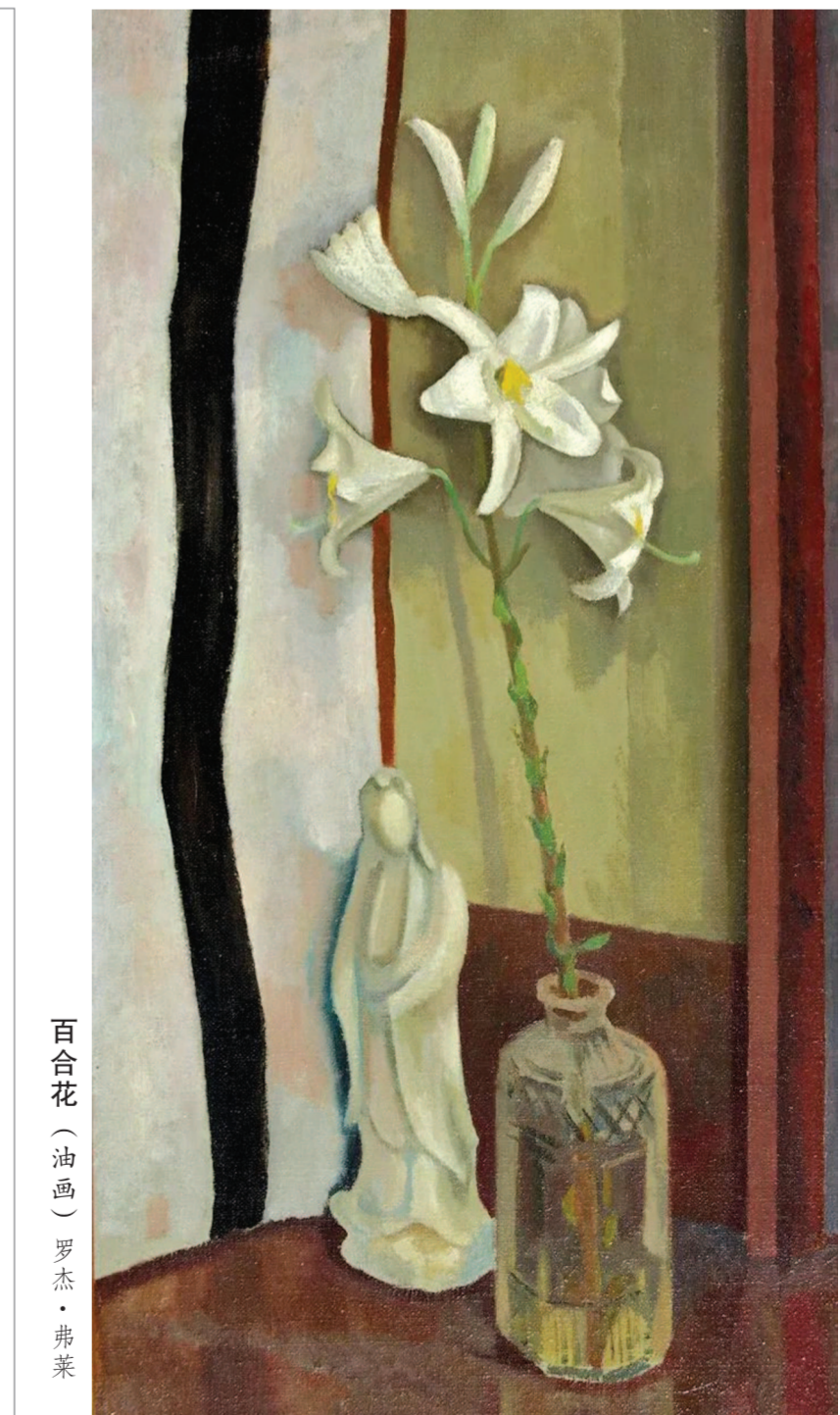
那么，在“一个菜篮”，有时候青菜、油菜“混说”了，也有可能。只是这一个“藏菜”的称呼，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可以腌渍以后囤积起来过冬，供新鲜蔬菜少的季节来食用。早在《文选》的注文里，就有“藏菜曰菹”的说法。《释名》云：“菹，阻也。生酿之，遂使阻于寒温之间，不得烂也。”

最后一种可能，即是“存其音”而已。如果只是记其音，那么可用“藏”，也可用其他同音的字，比如“小棠菜”，都无可不可了。这样，便不能从“藏”字本身来定其意思。不过，这个音的后面总应该还有“东西”，由其音去联想，这还是一个未解的“尾巴”。

让人感动的是，褚先生接到我的微信时，尚出门在外，不仅马上回复了，而且答应一回到家，就把他手头有的资料发送过来供我参考。他认为，藏菜名的书写，至少有常菜、上菜、塘菜、棠菜、床菜等好几种，其实都是“语转词”。这是因发音变化和传统词语缺乏了解，方言书写中出现的“语转词”，即声音稍有变化写出来变成另一个词，成异形词。青菜、藏菜名的记载，从地方志看，非常复杂，也非常混乱。这同先前的文言记载过分简单、没有图示，以及后来的人不熟悉农作物有关。

这些意见，我觉得都很中肯。知堂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起过：“清季的学者张啸山在笔记中曾叹说，读《诗经》《尔雅》，不明白那些动植物是什么形状，看见了实在的东西，又不知道他在书上是什么名称。这两句话很能说出向来研究名物的缺点。孔子教人学《诗》，说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后来学者便忠实的这样做去，记住了好些雕鸡卷耳的名字，及至见到了他们却又对面不相识，也并不想认识他们，但是著作起来可以写成整本的书，引据渊博，而他们外人看了还是不得要领。”

所以，唯一可取的办法，首先是取一个“集注”的态度，把那些“混乱”都一一摆出来，然后再一一梳理一下，当时古称的东西，即是如今的什么，然后回过去再看古称之由来，那便极有乐趣。还有各种混说“致乱”的原故，那里面也有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方人们的观察、认识和生活细节，即便张冠李戴是错误了，而一旦整理清楚了，却也是愉快的。



百合花(油画) 罗杰·弗莱

笔会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